
“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

〔日〕山根幸夫著 周启乾译

译者按：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1932年，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炮制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后，狂热的陆军军人如石原莞尔、辻政信之流，便与右翼学者相结合，为培养其“满洲建国”和“道义世界”建设的“人才”，而筹划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建立该校。1937年8月，颁布所谓“建国大学令”，并由“国务总理”张景惠任校长，实际管理权力则操于担任副校长的日本入手中。1938年5月正式开学时，傀儡皇帝溥仪亲临发表“诏书”。该校学制6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谓“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日语教学亦占极大比重。在后期3年中，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学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则均在必修之列，都是为推行“日满一体”乃至“大东亚共荣圈”而服务的。

本文是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山根幸夫教授1991年7月13日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讲演，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这一侧面，并对中国人民表达了友好的感情。

我对建国大学抱有很大兴趣的原因之一是，1985年6月访问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为该所研究生集中授课期间，曾听到当时讲授日本政治的那庚辰先生说起“我曾是建大的学生，并被捕关入新京监狱约4年，直至日本战败”。

关于这件事，在此前发表的《“满洲”建国大学之一考察》一文中曾经论及，现再作一重复。1940年11月，建大的第一期学生曾以修学旅行访问日本，并参加了纪元2600年（战前日本把所谓神

武天皇即位之年定为公元前 660 年,称之为“皇纪”元年——译者)的祝贺仪式。“中华民国”(汪政权)的留日学生访问了建大学生。由于同是中国人,他们相互谈了许多。当时,中国留学生对建大学生说,“诸君,虽说满洲国是道义国家,但事实上它难道不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制造出的傀儡国家吗?我们(中国人)必须内外合力以收复失地。诸君正是中国民族选拔的战士”,热烈地向他们发出了号召。建大学生平日即对大学当局及教师们所说的“民族协和”抱有怀疑,不相信“满洲国”的政治方向,所以从中国留学生的号召中受到很大冲击,认为其说是有道理的。他们与中国留学生约定好今后要合作,还详细商量了互相联系的方法。他们回到“满洲国”后,就不断有自中国内地的信寄来。建大的负责人对此产生怀疑,便报告了宪兵队。

关东军宪兵队开始秘密地进行调查,1941 年 6 月逮捕了 17 名中国学生,关押于新京监狱。建大当局,尤其是副校长作田庄一,对于事件的出现感到震惊,大概是由于他原来很有信心要把建大的教育顺利推向前进吧。大学当局立即向中央官厅及各个方面做工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宪兵队坚不应允。

不仅如此,大约十天后,又进行第二次逮捕。有些学生害怕被捕而逃走,校内陷入混乱状态。“搜查完全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或是中国国民党(重庆)的煽动,大学当局也掌握不住事情真相而没有办法。”

究竟一共有多少中国学生被捕、受到审判和处刑,这些都不清楚。但他们被关押在长春的监狱中,直至日本战败,则是事实。

这次事件受冲击最大的是副校长作田庄一。自建大开办以来,他即作为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管理学校,人事权也由他掌握。由于发生了这一事件,作田不得不因对学生监督不周而立即提出辞呈。然而,受理他的辞呈是在 1942 年 6 月。代之担任副校长的是挑起张鼓峰事件的尾高龟藏。这大概是关东军强力推荐的结果。

我对建大抱有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相识者中有一些人曾

经供职于建大。我在姬路高中三年级时，西洋史的教授安藤俊雄曾往建大赴任。他是经已在建大任职的原姬路高中教授丹羽正义（东洋史）的劝说而前去的。不过，未等到日本战败，安藤就辞去建大职务返回了日本。我在东京女子大学的同事大森志郎（教日本史），一次也没有谈起过建大的事。这些人大概都因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难以忍受建大的空气而对它没有好印象吧。我在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的高年级同学高桥匡四郎和寺田刚，当了建大的副教授，高桥是纯粹的研究人员，但寺田则是热烈的天皇主义者，在东大当学生时即参加了平泉澄教授领导的朱光会，具有皇国史观（把日本视为天皇“万世一系”统治的国家，是战前日本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译者）。战后，他也长期与台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从建大毕业或曾在建大学习过的日本学生如何看建大，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仅就我所见，当时建大学生中的日本人对于新京时代十分怀念，建立了同窗会，现在象是仍要温旧交。难道他们就没有对建大生活的反省吗？

一 日本的傀儡大学

正象“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那样，建国大学也是日本的傀儡大学。最近，斋藤利彦发表了《“满洲国”建国大学的创设和展开》一文，他把建大当作“满洲国”的高等教育的一环。然而，我则认为应把建大置于一般教育体制之外。

建国大学究竟是怎样诞生的？构思设立建国大学的，乃是关东军的中坚军官。他们认为，为了培养能够成为建国斗士的人才，而要设立大学；为了设立大学，首先要创设研究院，用五年时间培养建大的教官，五年后以亚细亚大学的名称建立大学。这是因为他们绝对不愿采用具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人来担任大学的教官。然而，形势不允许拖延时间，需要立即开学，关于亚细亚大学的设想便暂时搁置下来，而决定设立建国大学。

实际制定建国大学设立草案的是辻正信、片仓衷等中坚军官，并在东京创立事务所。委员中有作田庄一（京大教授）、平泉澄（东大教授）、笈克彦（东大教授）、西晋一郎（广岛文理大学教授）等人。而其核心人物则是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有关人员。波多野善大（后为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也曾一度在此创立事务所中工作过。

建国大学的创立，并没有“满洲国”方面的人员（中国人）参加，这是事实。设立一个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而该国“政府”竟然与之毫无关系，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这能说是“满洲国”的大学吗？仅从这一点看，建国大学乃是傀儡大学也是很清楚的。

建国大学还与“满洲国”其他的大学不同，它不在文教部的管辖之下，而是被置于国务院的管理之下。校长由国务总理兼任，而实际上副校长（日本人）是最高负责人。一个国家的国立大学，其最高负责人有任命外国人担任的吗？当逮捕中国学生事件发生，作田提出辞呈后，预备陆军中将尾高龟藏便被任命为副校长。作为张鼓峰事件败军之将的尾高，为什么能当副校长？这一定是根据关东军的意向。建国大学不是国立大学，实际上是关东军的大学。

其次，建国大学的大部分教官是日本人。在我所调查的 1941 年 7 月的任职教师中，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 9 人，他们是鲍明钧（中华民国人，政治学博士）、苏益信（中华民国人，政治学博士）、崔南善（朝鲜人，三一独立宣言的署名者）、高起元（以上为教授）、李松伍、许彦午（以上为副教授）、徐成立、陈松龄、卡鲁尔·海因茨·艾肯特（以上为专任讲师）。而日本教官则有 71 人。外国（包括中国人）教官只不过是日本教官的 1/8，这不是太偏重于日本人了吗？日本教官竟然相当于中国教官的十倍。这样的国立大学，即使找遍世界，又能在哪里见到呢？

下面谈谈学生的问题。由于建国大学是以“五族共和”为原则，所以决定“满人”（中国人）、朝鲜人、白俄、蒙古人、日本人平等入学。在“满洲国”所说的“满人”，并不一定是指清朝的后裔，而是把住在满洲的满族、汉族人全部包括在内，称为“满人”。

1941年3月,建大一年级第二学期在册的学生总数是126名。其中日本人60名,朝鲜人5名,台湾籍中国人1名,如果把朝鲜人等也作为日本人计算,那么日本学生总数即达66人,占了半数。其他学生是“满人”49名,蒙古人5名,俄罗斯人6名。尽管“满洲国”国民在当地占绝对多数,但“满人”学生同日本人相比也要少十多名。而且此后进入建大学习的日本学生还在渐渐增加。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日本学生入建大学习呢?最初,许多日本学生认为,如果从建大毕业,就能登上仕途,成为“满洲国”的高级官僚。但现实是,有许多日本官吏进入“满洲国”政府,建大学生即使毕业,也已没有所希望的好位子留给他们了。建大的毕业生一般只能成为中下级的官僚。不过,一旦进入建国大学,一切费用即由“满洲国”支付。这种情况在日本国内也有,与陆军士官学校及海军兵学校全用官费相同,连入学考试所需的费用都由“满洲国”发给。一旦考入建大,衣食住全是官费,每月还发给若干零花钱。当时,在日本要入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而又没有充足学费的家庭,便希望子女入建大学习。因此,建大聚集了相当优秀的学生似是事实。然而,对于日本人以外的其他民族来说,入建国大学求学则是很难的。

从以上各点看,建国大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大学,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二 建国大学的教育内容

参与设立建国大学的关东军、参谋本部的军官及学者们,对于当时仿效欧美大学的那种自由主义的办学方向,抱有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进行自由主义教育的大学对于“满洲国”来说是有害的。因此,打算建立一座与欧美式的大学完全不同的新大学,就成了有关人员的一致愿望。那么,建立的新型大学究竟是怎样的呢?

建国大学实行塾、教场(教室和训练场)及研究院三者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建大的教育由三部分组成,即“为了掌握建国精神,陶

治作为领导人的性格,通过塾的日常生活所进行的”性格教育;“为训练能够担当国家重任之资质,由精神、军事、武道、作业等各种训练所进行的”资质教育;“为掌握统治与经营国家之学术,培养作为建设道义世界的领袖的才干器量,由学科教授而进行的”勤务教育。性格教育、资质教育和勤务教育三者密切相关,相互联系和补充,资质教育给性格教育提供不可缺少的营养。同时,把性格教育和资质教育加在一起而形成的“性质”教育作为基础,而把勤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把这样的统合教育作为目标。

实施这三种教育的方法是,性格教育由塾务课担任,资质教育由训务课担任,勤务教育则由教务课担任。这样,建国大学的教育方针可以说是,以塾为中心,统合大学的机构重新改组而成。

训务课中分配有军官 2 名,军事教官十多名(佐官、尉官、准尉),骑马教官 4 名,农作业、剑道、柔道、合气道教官数名,事务官数名,担任训练工作。进行骑马、农作业、合气道等训练的大学,在别处是见不到的。为了学员接受骑马训练,建大校内饲养马匹百余头;为了农作业,校内有耕地 30 町步,养猪数十头,乳牛数头及许多鸡。学校所需蔬菜、肉等全部自给自足,有如某种农业学校。

军事训练的时间非常多。把每个年级的 150 名学生编为 7 组,每组 20 余人,约有 4 名教官加以指导。这一训练极其细致,进行了十分彻底的指导。其目标是“如有必要,可作为现役军官立即派往第一线”,而进行相应的训练。可以说,它也具有士官学校的性质。其训练的残酷,是日本的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军事训练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与军事训练并行,还重视农业训练,这是建大教育的特征。原则上大体是上午学习课程,下午进行训练。学习与训练在时间上的比例是二比一。在夏季和冬季还增加特别训练,塾的内务训练、集合旅行训练等也反复进行。当时,在日本的学校中也施以如此严格训练的,只有象士官学校、兵学校那样的军事学校。

总之,建国大学具有把文科大学、士官学校和农业学校综合在

一起的形态。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是轻视劳动的,所以对于入大学后被强制从事农业劳动,当然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而在日本学生中,地方出身的要比城市出身的为多,而且农家子弟也很多,所以恐怕完全没有对农业劳动的反感。完全无视中国学生的心情,强制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从这一点看来,建国大学的教育方针完全是根据日本人的想法来行事的。随着升入高年级,中国学生出于对这种农作业及武道训练的反感,离校而去者便增加了。

建国大学为何如此异乎寻常地重视军事训练及勤劳训练?显然,建国大学采用这种教育方针的背后,有关东军的强烈意向。同时,热烈支持此种教育方针的精神主义及国家主义的教官也有很多。可以说,许多日本人,被录用为建国大学的教官并非因为他们的学识,而是由于他们具有精神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

对于建国大学来说,比上述训练教育更为重要的,乃是塾务训练。既不称宿舍,也不称寮,而是称为“塾”,这是建国大学的特征。在建大,全体学生被强迫住在塾中,在塾头的监督下过着军队式的严格的日常生活。塾的纲领中规定:“在塾起居之间,领会建国精神之真髓,从而成为不惜身命的实践的先觉者。”个人自由完全被否定,强制性地过着集体生活。

看一看塾的结构:预科一二年级学生所用房间,每室容纳 25 人,寝室是塌塌米式的,每人只有一张席子的位置,自习室是不铺席子的房间,备有 25 人使用的桌椅,这是一种完全否认个人自由和隐私的结构,是模仿日本陆军内务班的结构。升入预科三年级后,便改变住处,每室容纳 6 人,但寝室仍是日本式房间,有 12 张席子大。自习室是西式房间,大小与寝室相同,每人发给桌、椅、书架,与预科一二年级的房间相比要好得多。尽管如此,对于塾中这种完全否认个人自由,强迫的集体生活,以中国人为首,包括其他民族的学生在内,会感到怎样的痛苦,是不难想象的。

塾的运营管理,由塾头(职员)、副塾头(助手)、值班塾头(职员)、值班助教(职员)担任,学生中则有值班塾生、塾委员、训练班

长、学科班长参加。预科一二年级(各为 150 名)分为 6 个塾,每塾任命塾头(或副塾头)1 名。作为塾委员的学生,系由预科三年级中任命。塾委员遵照训练教官及值班教头的指示,要指挥塾生,发扬学风,要成为塾生的模范。

塾内的生活系根据严格的作息时间表进行。自早 6 时起床至晚 10 时就寝,大体以 30 分钟为单位规定作息时间。每天早晨以敲鼓为号,同时起床。起初,在进餐前要齐唱二宫尊德所说“举箸当思天地之惠,父母老师之恩”这样感谢的话,但是,大概由于对这种日本式的作法反感太大,不久便改为仅作默祷了。

在建国大学的校规中,没有谨慎(闭门思过)、停学、退学那样的处分,而实施的是由塾头等执行的“人的处罚法”。这就是用铁拳来制裁。当时的一个塾头曾说:建大的塾的生活,是站在以人格来培养人格的立场上,象铁拳制裁那样的方法反而是最有教育作用的,最尊重人格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最日本式的。在日本军队内部,铁拳制裁当然是不在话下的事,但是,把它当作大学中的教育手段来运用,不就太野蛮了吗?日本学生也许对于铁拳制裁还能理解,但是,中国学生被别人殴打后就感到是受了最大的侮辱,他们怎能适应这种环境呢?在建国大学的教育方针中,到处都是根据日本人的想法,采取无视其他民族的感情及习惯的作法,这徒然招致中国学生的反感,造成了反日、排日情绪的高涨。

一开头就应该说明的是,建国大学的通用语言是“日语”。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竟然不用本国语言,而用外语进行教育,这意味着什么呢?建大不仅强迫学生使用日语,连教授们也被强迫使用日语。日本学生虽然也必须学习中文,但他们是否认真学习则不得而知。

如上所述,建国大学的教育方针是遵从关东军的指导,在许多方面,是把基于日本人的想法和各种作法强加给中国学生等,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为什么日本人如此无视其他民族的感情及习惯?这大概是由于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民族的自命不凡,而

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其他民族吧。

尾声

1945年8月8日,当苏联对日宣战并立即开始出兵东北时,“首都”新京的命运就成了风前残烛。8月11日,建大副校长尾高紧急召开只有日本教职员参加的秘密会议,商量今后的方针。傍晚,虽然再次召开全体教职员会议,但日本人以外的教职员全都不见踪影,日本人中也有未参加者。

建大虽说是“满洲国”的最高教育机关,但是谁也不承认建大的权威。对于“满洲国”本身,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民族也决不认为它是个独立国家。如果他们把“满洲国”视为自己的国家,那么,当苏联军队进入时,说不定就会持枪进行战斗,但是,当日本战败已经明朗时,“满洲国”军则立即倒戈。

由于“满洲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所以在瞬间崩溃也就是必然的了。日本战败后,中国人当然要把它称为“伪满洲国”,作为伪满洲国最高教育机关的建国大学也是伪国立大学,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大学,这样的大学,又如何能对多民族的学生平等地进行教育呢?建大正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学。

参考文献

竹山增太郎:《以塾教育为核心的建国大学指导教育》(《兴亚教育》1—2,1942)

山根幸夫:《“满洲”建国大学之一考察》(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讨论》94,1987)

江原节之助:《民族的苦闷——围绕创设时期的建国大学》(冈崎精郎解说,《东洋文化学科年报》4,5,1989、1990)

齐藤利彦:《“满洲国”建国大学的创设和展开——“总体战”下高等教育的“革新”》(《总体战下的“满洲国”的教育、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作者单位: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